

## 中外科技关系面临严峻挑战

安东尼·韦尔奇

安东尼·韦尔奇 (Anthony Welch):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University of Sydney) 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教授

电子邮箱: anthony.welch@sydney.edu.au

美国决定撤销 1000 名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 是最近加强对中美科技研究关系限制之一。早些时候的行动包括美国政府逮捕几名没有承认接受过中国研究资金的 (在美) 华人科学家, 这些资金主要来自于中国的人才计划。

但这种行为, 包括起诉不承认军事关系的中国研究人员, 受到了一些美国研究人员的批评。他们提出了中国医学研究人员被默认怀疑的例子, 仅仅是因为他们工作的大型中国医院与军方有某种联系。此前, 美国曾拒绝向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 (STEM) 领域的中国研究人员发放签证, 尤其是那些与“中国制造 2025”政策有关的研究人员。该政策优先考虑了关键的高科技领域: 如 IT、机器人、航空航天技术、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 包括语言、不同的认识论和解释框架、审查制度等)。

### 限制传播

美国的行动是所谓的中美贸易战的一部分,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是一场科技战争, 甚至可能是一场意识形态冷战。白宫 2020 年的“战略方针” (Strategic Approach) 文件中提到的研究列出了盗用技术、窃取知识产权、违反机密性和未披露外国利益。但是限

制国际研究合作的措施正在蔓延。欧盟与中国研究人员的实质性和长期合作最近受到了欧盟委员会研究和创新总干事让-埃里克·帕奎特 (Jean-Eric Pacquet) 的挑战, 他警告称, 中国方面的科学数据缺乏透明度, 并限制了几个最强大的科学领域的合作。据帕奎特说, 欧盟不再相信与中国的科学联系是对等的。他认为, 虽然进入欧洲是自由和开放的, 但进入中国是“繁琐的, 有时受到限制”。这些担忧, 包括对强制技术转让的担忧, 预示着一个即将出台的框架, 将更明确地界定欧洲大学和研究机构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包括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与美国一样, 欧盟在科研合作上立场的改变是其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 从将中国视为战略伙伴, 到 2019 年 3 月将其列为系统性竞争对手。

日本也在考虑加强对中国研究人员和科学家的限制, 以阻止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制造等领域的高科技研究泄漏。拟议的指导方针将加强签证审查, 并要求日本大学和科研机构申报所有海外研究收入。但是, 尽管 2017 年在 39473 国际研究人员中有 6313 名中国研究人员, 但尚不清楚他们中有多少人专门研究敏感的高科技领域。此外, 一些日本科学家表示担心, 保护敏感研究和加强研究完整性的措施不应限制开放的科学和创新。

在越来越多的外国干涉声中，澳大利亚提议对外国影响进行议会调查。调查特别包括了澳大利亚的大学，并列出了对研究合作的担忧。虽然没有具体提到哪个国家，但中国显然是目标。两名被誉为扩大澳大利亚在华研究的中国著名研究人员成为最初的目标，他们的签证被取消，这一事实并没有让人相信国家正在实施一项复杂的策略。在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 (Global Engagement Centre) 的资助下，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于 2019 年开发了一项国防大学追踪系统：一个涉及军事或安全相关科学技术研究的中国机构的数据库。该网站包括近 100 所大学、50 所中国人民解放军机构、3 家国家安全机构和 12 家国有国防工业集团的个人条目。

### 与美国不同：欧盟与亚洲

美国正在向其所有盟友施压，要求它们追随美国的脚步遏制中国，包括在研究合作方面。日本很可能效仿。但中国仍热衷于开展国际合作，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欧洲或亚洲大部分国家希望如此严格地限制自己的选择。举例来说，选边站队将与东盟长期以来想要在两个日益敌对的超级大国之间最大限度地争取回旋余地的愿望大相径庭。东盟成员国中没有任何想要限制与中国进行研究合作的迹象，中国实际上是许多东盟研究体系的主要知识伙伴。例如，就连与中国有着悠久而复杂历史的越南，也没有表现出想要削弱与经常惹麻烦的大国邻国间研究关系的迹象。此外，几个东盟系统集聚了大量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的海外高技能人才。

### 风险

上述例子往往表明，国家安全问题主导了国际研究合作的决策。但也存在相关风险。第一，“婴儿可能会和洗澡水一起被倒掉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water, 比喻切忌不分良莠，好坏一起丢掉)”。我们显然需要的是，在将敏感的高科技项目与其他许多不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项目区分开来时，需要更加周全的计划。正如研究中国科学崛起的专家、苏州昆山杜克大学 (Duke Kunshan University) 前主任丹尼斯·西蒙 (Denis Simon) 最近所说的那样，“认为这是一个全面的阴谋，太不现实了。”

这个方法的第二个风险是，许多有天赋的中国研究人员可能会决定不去美国或其他有类似限制的系统。或者他们可能会离开美国：已经有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一些华裔研究人员正在离开。其他国家则将他们的研究合作转向日本、英国（然而，英国最近公布了选择性禁止的学术批准技术计划）或欧洲。正如一些美国研究人员所警告的那样，这一结果可能代表着中国的胜利，但对美国的研究来说却是一个净损失。

最后一种风险可以说是最令人不安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在全世界一些系统中的崛起。与此相关的将国家安全凌驾于外交和学术关切之上的做法，可能会破坏完善的双边和国际研究网络，这些网络越来越多地支撑着许多全球研究产出。当有三分之一的全世界所有出版物由来自至少两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时，当中国和美国在共同发表的论文中互为最大的合作者时，把世界科学大国之一中国所做的众多贡献排除在外是明智的做法吗？